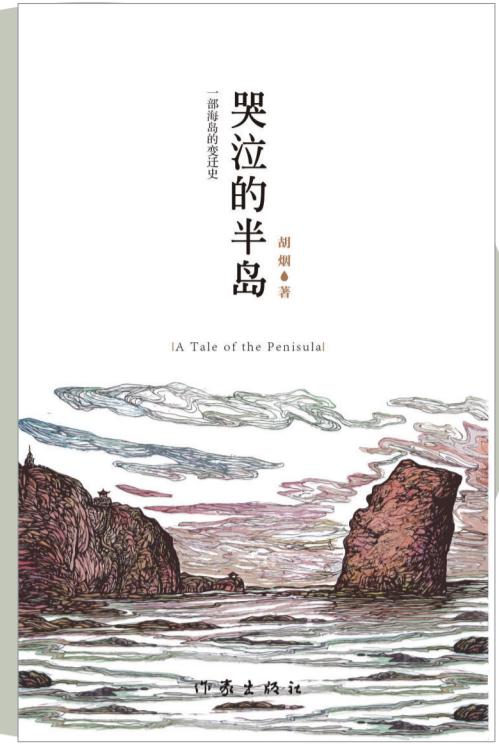


## 故乡的消失与重生

□ 张炜



胡烟出生在山东屺岡岛,与连接了我少年时期生活的林野,二者直线距离大约只有20里。那是一个南、北、西三面环海的半岛,宛如一只长柄勺伸向渤海。这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水质清净,沙滩白细平缓,是最好的养生地。相传,元末明初之时,大将军胡大海由于长年带兵随朱元璋征战杀伐,便把老母亲寄养安置在这个岛上,“屺岡”(寄母)一名即由此而来。

屺岡岛的确有很多人姓胡,或许都是胡将军的后裔。胡烟从渔村走向北京,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并做了报社编辑。多年来她采访了大量文化人物,书写了近百万字的访谈文章。她眷念家乡,以敏锐的目光,回望半岛人的生存,记录了故乡消失与重生的过程。散文集《哭泣的半岛》,既是她对故乡的情感回馈,也是她厚积薄发的文学成果。

胡烟的文字充满爱。她爱大海,爱家乡,爱海边的人。她与屺岡岛一同欢乐一同悲伤。裸露的礁石,无垠的海滩,荒蛮的山野,白细的沙子,鲜活的生物,奔跑的禽鸟,一并汇入其笔下。

爱如银线穿珠,形成了《哭泣的半岛》。大海与人共同构成了书的主角。胡烟的文字中活跃着一个个灵动的生命,以血肉爱恨演奏出一曲半岛交响。

胡烟笔下的人物大都生活在最底层,他们世代以赶海为生,于惊涛骇浪中繁衍生息。这些半岛人厚道善良,如“父亲”爱惜生灵,打到小鱼小虾会放归大海,捕到大螃蟹,也会放归大海,说:“小鱼小虾正在生长,大鱼大蟹长大不易。”外地杀人犯跑到北山跳海,正在船上的“爷爷”二话不说跳进海里将他救出……这些海与人的画面真挚感人,给人以异样的温暖。

《哭泣的半岛》的另一个主角是动物。在胡烟笔下,狗、狐狸、刺猬、黄鼬等,都是有灵性有情感的美物。半岛人都姓胡,“胡”“狐”同音,因此大家对狐狸格外亲近敬畏,称之为“狐仙”。传说狐仙法力高强,可幻化成人形。半岛上的狐狸会嫁女,会取水,会站在房顶上集体跳舞……书中讲述的“狗偷肉吃”、“狐狸压水”、“刺猬脱逃”等故事,融传说、亲情、智慧于一体,阳光正义,颇得《聊斋》神韵。

这是一部饱含海水咸味、弥漫泥土芳香的屺岡风情画,是原汁原味的渔村生活图景。

胡烟的文笔游刃有余、朴实灵动、诙谐幽默。儿时趣事、家中琐事、半岛大事,她皆信手拈来,一吐为快,成为笔下的话题和说辞,读来令人欲罢不能。如《黄鼠狼报仇》:“大黄狗有半个人高,年富力强,从南院窜到北院,来回跳腾着,像是巡视,也像是发泄过剩的精力。”再如《我弟》:“我弟学武术,一学五六年,回家练个后空翻,算是向我汇报工作。”又如《小姨》:“记忆里,小姨家的门是黑的,抑或是深紫的,幽闭了一院子的秘密。”

我读这些文字,体味到的是半岛之美。我相信一个异乡读者,也一定会被半岛之美深深地打动,并心向往之。

但遗憾的是,宁静的半岛已经消失了。胡烟眷念故乡,企盼半岛重生。所以,读她笔下爱恨交织的文字,更有了别样的况味。

小说家应该能够在复杂的社会形态、历史空间中真切地反映现实,用通透、鲜活但不谄媚的表达解构普通人与政治、时代和文明流变中的关系,作家秦岭显然具备这一优势。近期,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眼·看中国”丛书,精选了全国50多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共汇编10部,其中秦岭的个人作品集占了3部,分别是《不要你娶谁》《借命时代的家乡》和《透明的废墟》,其中《透明的废墟》是专门反映地震灾难的小说集,前两部作品集则精选了秦岭自2003年以来在各大期刊发表并受到好评的作品。这些小说被学界认为具有“新鲜又沧桑的异质气息”,运用“别开生面的叙事方式”,体现出秦岭解构公共事件的能力和独特性。

以农民精神为切入点揭示出人性合理欲求和现实残酷交锋的荒诞

杨显惠认为:“秦岭笔下的乡村由于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的关联性而笼罩在一种精神气场下”,此观点颇为中肯。秦岭以“尖山”作为自己的文学之域,描写了生活在那里的乡民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些小说转载率普遍较高,且常登上各类小说排行榜,就是因为它明显超越了对现实的捕捉而直逼农民的灵魂。

中篇《借命时代的家乡》中的董、苟两家之间本来是由宗族乡规维系的、根深蒂固的农家传统关系,可是面对“破四旧”、“文革”、联产承包、市场经济等一系列外力的影响和冲击,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被逼到了博弈的浪尖。主人公董建泉“忘恩负义”的婚变、违背常理的叛逆、勤劳发家的成功以及对伦理坍塌的救赎,构成了新时期农民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令人惊心动魄的现实状态。

短篇《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以干旱缺水的西部乡村为背景,以一位孕妇和同样怀孕的狐狸之间既惺惺相惜、又彼此提防的心灵交融、博弈、救赎为主线,毅然用低贱的生命向物质社会对资源的掠夺、人性的冷漠、社会的不公进行挑战,向物欲横流的社会规则发出强烈的批判。

中篇《绣花鞋垫》《不要你娶谁》、短篇《硌牙的沙子》《本色》等属于秦岭的“乡村教师”系列。面对城乡经济的巨大反差、“三农”问题的蔓延和农民传统地位的沦陷,秦岭对乡村教师的尊严危机、人格变异以及“娶妻难”等问题报以深深的同情和忧虑。校长纵容棍棒教师找女学生为妻、女学生攀附男教师,当这种看似严重违背师道尊严、社会伦理的“歪风邪气”成为稳定师资力量、保证教育教学的现实需要和主流时,秦岭已经为我们观察农村社会在希求改变方面提供了非常

## 在心灵深处掘进

——读刘庆邦长篇小说《黑白男女》 □老九

在当代文坛,刘庆邦无疑是一位优秀的、有重要影响力的、有自己鲜明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刘庆邦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已有几十年,他执著、决绝、“一根筋”,甚至表示要将现实主义进行到底。他坦言:“我这一生在创作上无需更多的主义,能把现实主义的路子走到底就算不错。”刘庆邦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2015年春天在《中国作家》全文首发,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连载众多,受影视青睐,好评如潮,并荣获“鄂尔多斯文学大奖”。《黑白男女》的心灵化、诗化、哲理化,《黑白男女》的大爱、大善、大悲悯,《黑白男女》的语言、结构等要素的成功构建,不仅使刘庆邦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越走越深远,而且使现实主义兼收并蓄,拓展深化了现实主义本身。

《黑白男女》仍旧写矿难,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一次炸死了138名矿工。许多家庭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的悲剧集中在众多矿工家庭上演。这本来是一个重大的悲情题材,生活像铅球一样落地生坑,生离死别的冲击惊心而惨烈。刘庆邦将巨大的悲剧作为一种视角、一道侧光、一个切口,他没有正面铺陈瓦斯爆炸后的善后处理,而是另辟蹊径,静水流深、不事声张地叙述了周天杰、郑庆生、卫君梅、蒋妈妈、秦风玲等五个家庭成员重大灾难后的心灵轨迹、生活状况和命运抗争。矿区那些芸芸众生,悲痛中蕴藏着一种坚定、庄严和倔强。在苍凉灰暗之上,小说的调子辉映着亮光、温情和暖意,超拔出绝望之后的希望,将死之悲哀和生之顽强、颓亡废墟与新生活开启筑成了一曲悲壮的生命礼赞。

“事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事兮何所终”。世道人心是复杂、混沌、多变的,有多种可能性,线性思维于事不违,辐射思维才是正大一途。因此,复杂、厚重、丰饶、饱满是优秀小说的题中之义,特别是长篇小说。《黑白男女》娴熟、老到、精准的叙事始终在人物、心灵、细节中深入掘进,从而回应了我们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比如小说主要人物卫君梅。卫君梅的处境是多么复杂、尴尬、吊诡,她的所谓尊严、坚强与操守,是多么地脆弱、野蛮与扭曲,多么地不堪一击。爱情在某种范围内是环境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压抑、控制爱的冲动,将生存与生活作为首要人生标准,这是无奈而悲凉的。卫君梅面对风华正茂的青工蒋志方不是没有动摇过、遐想过,她曾勉强接受了蒋馈赠的手机,最后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坚决奉还。她想爱,想婚姻,想有一个完整家庭,但她不敢爱、不能爱,更不能重新结婚。刘庆邦真正展示的,也许是“爱情名义”背后复杂、尴尬和难处的人际关系,是严硬如铁的“法则”,是生存和生活的艰难,是惧怕家庭再生变故,是失去房子等更多难以预料的风险。卫君梅已经爱不起了,改变不起了,因为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了。这都是她不能承受的爱之沉重。为了稳定现有的家庭秩序,她必须放弃所谓的“爱”或者“同情”,压抑对新生活的向往。小说中洗煤厂女工杨书琴一语道破天机:“她要重新嫁人了,房子恐怕就保不住了”。其实,杨书琴、秦风玲们对再婚的想法是相同的,她们一门心思要拉住一个男人,否则日子是熬不下去的。但卫君梅有自己做人的底线,必须要抛弃非分之念,对多难生活中的所谓“爱情”有一个基本判断,她想活得真实,对自己负责,对孩子负责,言行一致,这关乎她继续生存的脸面与勇气。当她下决心还手机斩断情思之后,对她素常敬佩的郑宝兰终于忍受不住,对卫君梅大发脾气,“最后一根稻草”同样把郑压垮了。反常为妖。

郑宝兰顿然让我们疑惑。其实这是小说家一种高明的叙事策略,让读者透过表象看本质、看复杂、看心灵深处的精神压力。同样猝不及防失去丈夫的郑宝兰也活得不容易,公公癌症、父亲瘫痪、母亲双目失明、孩子闹腾、要守住“身份”……她面对的大多是没解的挠心事,谁予抚慰?与谁诉说?世俗生活,就是实在之笼,不管“城内城外”,她们都难承受,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没有把握世俗生活实在本质的作家,哪能把握小说的心灵质感。刘庆邦重人道,重天道,有一颗赤子之心、悲悯之心、仁爱之心,故他的叙事道法自然。因为生活还要继续。

人要说话,小说家更是活在语言的氛围里。梅洛·庞蒂说:“因为在作家那里,思想并不从外面主宰语言,作家自身就像一种新的习语,它自己形成自己发明表达手段,并按照它特有的定义产生变化”。《黑白男女》的语言大俗大雅,大土大洋,洗尽铅华,它所使用的大白话带有地地道道的矿工味,特色非常鲜明,可以说与矿工矿区血脉相通,筋骨相连、水乳交融、诗意盎然。有评论家称,翻遍古今中外写煤矿区的小说语言,无人能出其右。我们看左拉的《萌芽》、劳伦斯“诺丁汉矿区”三部曲、巴尔多梅罗·利约《十二号风门》《胡安·法里尼亚》《地底下:矿工的景象》等,这些煤矿矿工小说的总体语言,显得过于板正、书面、游离,与主体生命缺乏血脉相连的互动、整合、共振,从“题材动力论”的意义上说有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谓“隔”的感觉。对此,刘庆邦早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人是环境动物,也是伦理动物。矿工是离开土地、离开田间耕作的农民,有农民的心态、农民的文化传统,只是他们比田野耕作的农民更艰难,更具有强韧的力量,这是一群看透生死的人。”中国的煤矿大多在城乡结合部,有的在山区丘陵地带,甚至深山,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有的煤矿仍然“通讯靠吼,交通靠走,娱乐靠酒,治安靠狗”,是一个相对封闭孤立的社会单元。它既有农村的特点,又有城镇的脉动,语言、风俗、习惯可自成一体。再加上矿工下井直接面对大自然,属高危行业,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五“毒”俱全,从矿里上来,除了牙是白的,其他都是黑的。矿工们在井下就爱说“克拉邦语言”,男女那点事,如此的“软文化”“市场兴旺”。矿井下的语言是一种存在,一种强大、顽强的存在。忽视、忽略或消解这种语言,产业、环境、人物、故事就难以烘托出来,起码小说会不够生动、到位、真实。《黑白男女》的语言几乎土得掉渣,既在泥土中滚过来,又在煤水中长久浸泡,连汗味中都有煤矿的气味,连牙缝里都有除不了的煤尘,连裤裆里都有又黑又亮一抖落散了架的煤渣,老少皆宜,妇孺皆通。比如小说“开头”一章:“采煤工不谈女人,煤炭产量低;机电工不谈女人,烧了发电机;掘进工不谈女人,巷道压得低;放炮工不谈女人,放炮如放屁”;杨书琴郑重其事地对青工蒋志方表白“我就是震动筛”;周天杰看自家的儿媳妇郑宝兰是一匹“母马”,儿子是“拴马桩”;秦风玲说自己死去丈夫的领带是“裤腰带”;郑海生瘫痪在床时对瓦斯拟人化的

痛骂;矿工下班回家骑自行车上坡等于“上老婆”,等等。语言是内心的一种反映,能准确驾驭语言并与文本浑然一体是优秀小说家的硬功夫,是同化,是境界。《黑白男女》语言针脚结实、细密、生动、准确、传神,符合人物性格,是该作的一大亮点。

刘庆邦是讲究技艺、控制感和节奏的作家,他熟悉小说的控制,认为当下小说的控制比放开更紧要。庄子《庖丁解牛》谓:“臣之所好也,道也,进乎技矣”。控制是他技艺的“道”。《黑白男女》放得开,收得拢,但不紧绷、不拘束、不扭捏,一派舒展大气,恰到好处。该交给读者的空间预留充分。我们再看《鞋》的“翻尾”,《西风芦花》的“虚写”,《种在坟上的倭瓜》的“抒情”等,就知道刘庆邦是多么注重小说技艺。《黑白男女》的结构,合理地吸收了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积极元素,还有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恢弘以及欧美小说的技法,不故作高深,不卖弄前卫,明白清晰,简洁明了。整部小说设“开头”,就叫“开头”,提纲挈领,引入入胜;然后是大量心灵化、诗化的细节;设一结尾,叫“结尾不是结束”,余音袅袅,回味悠长。“风头”“猪肚”“豹尾”齐活儿。每章节的标题也不玩花哨,意清字白,比如:第一章叫“没了儿子”,第二章叫“儿媳去了哪里”,第八章“我才不守寡呢”……小说中的人物起名,依百家姓而排,但去除了“赵、钱、孙、李”,从“周、吴、郑、王”开始。刘庆邦曾戏言“人生的目的在于生人”。他今年65周岁,已有小孙子,《黑白男女》中周天杰的小孙子戏份不少,并非闲笔,而是有物参照,有体会、有感悟,故小来灵活现,栩栩如生。周天杰与黄鼠狼的对峙是互为关注,互为仇敌,煤矿工团到龙陷矿的演出,众生亮相聚会等,都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整部作品结构起伏跌宕,和谐熨帖。

读罢《黑白男女》,我想起了关于小说真实性的问題。真实源于小说家对自己最熟悉的人物、事物、环境、情感、心灵、语言等最基本的审美、审美、思考。刘庆邦是真诚地深入生活、拥抱矿工的,从20年前某矿发生瓦斯爆炸到《黑白男女》出版,他19年里时常想写这部长篇小说,为此写过长篇报告文学,写了大量中短篇小说《信》《清汤面》《别再让我哭了》《黑庄稼》等作铺垫,查阅了百万字的资料,到该矿和其他煤矿企业采访了多次,与有关人士深谈31次,积累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再加上自己有农民、矿工、记者的阅历,这些文学作品与实证资料都为《黑白男女》的创作做好了充分准备,使他在矿工矿区中扎实起来,而且扎得深、广、实,故他在创作《黑白男女》时游刃有余,收获颇丰。

爱德华·纽顿在《聚书的乐趣》中说:“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其次是一本书,它使人抓住秘密的核心。”刘庆邦在《红煤》后记中郑重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生活总是风云四起,变故不断,而男女分开,却这般容易,刹那之间。珍重,黑白男女!

## 好作家是社会的代言人

——从秦岭的小说谈起 □李丽

开阔的思考疆界。短篇《杀威棒》完全站在农民立场审视知青生活,打破了知青文学的传统叙事。

民办教师用教鞭向无辜的知青子弟报以杀威式痛打,唤醒了曾经发誓“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知青对农村大地、农民尊严的痛苦思考。如果知青认为青春在蹉跎的岁月中迷失,那么谁来可怜、同情祖辈都困守在土地上的农民?这一主题,在以农民工、空巢老人、遗弃幼童为表现对象的短篇《一头说话的骡子》《摸蛋的男孩》《奔向》中均有体现。

小说中一系列生动、逼真的农民形象,不是普通作家笔下“隔”的农民,而是真正生活在现实逻辑中的农民,这些逻辑糅杂着民族的秘史和正根儿,有时又呈现出反逻辑的意味,而反逻辑同样是为了生活的守望和精神的追寻。秦岭客观、冷静地描摹着他们的精神状态,“从凡人身上挖掘出非凡的东西”,显示出一个作家的功力,所以才有评论者认为“在秦岭的小说里找到了中国的农民”。秦岭小说通过黄土地上农民挣扎的生活像揭示出人的合理欲求同现实残酷交锋的荒诞,这一镜像也成全了秦岭式的乡土异象。

在多向维度上审视权力基因、社会流变对农民精神的影响和异化

有着丰富农村工作经历的秦岭,非常善于把乡土叙事植根于权力和社会的多重经纬之中,用历史、政治、社会、民情的多向视角梳理农村社会的现实矛盾和人性秘籍,这让他的权力叙事区别于当下流行的官场小说。

在中篇《父亲之死》中,贵为一县之长的“父亲”下乡检查工作时突发阑尾炎,恰逢大雪封山,

由于他的“尊贵”身份,各级领导和乡镇干部谁也不好意思让县长在破败狭小的乡村卫生院接受手术,县长本人也口是心非地期待进城手术。在这期间,同样患有阑尾炎的农民赵把子按部就班地完成了手术,县长却终因延误手术时机而“因公殉职”,用可悲的死亡换来了“全县领导干部楷模”的政治标签,成为“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小说既惟妙惟肖地写出了在这个异化的权力空间里当权者之间的各种规则、动作甚或是意味深长的眼神变化,也从现场观察者的角度写



出了民众在权力空间里的卑微、妥协与残忍。

《风雪凌晨的一声狗叫》被评论者誉为“我国第一部公开反映计划生育的中篇小说”。省、市、县、乡、村各级领导干部悉数登场,竭尽全力搜寻超生妇女董爱翠,而各色人等面对政策、计生任务、劳动力现状,处理公事与私心、压力与人情的关系时,却各怀心事,暗度陈仓,欺上瞒下。而那一声神秘的狗叫,把各级权力统统聚集到斗智斗勇的人性平台上来,揭示了权力与乡村社会复杂、隐晦的现实形态。

这种权力。官与民都要对这样的现状负责或者付出代价,这就达到了一种双向辩证的哲学意味。”秦岭不仅对这种病态的权力气息进行了哲学和社会学思考,给予了揭示和鞭挞,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反思的路径。

从农民立场审视历史,拓展同类题材叙事的维度和格局

作为一名有思想、有担当的作家,秦岭从来不回避在小说中思考历史。值得一提的是,他不是跟风追俗地站在知识分子角度俯瞰历史,而是直接站在农民立场平起平坐地对待历史,并把乡土叙事与相关历史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在我们司空见惯的历史叙事中拓展了时空和主题维度,也丰富了读者审视历史的视界。

短篇《寻找》是秦岭以“家族”、史料结合而成的长征题材叙事作品,反映了长征时期天水秦岭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屡遭劫难的故事。他本来掩埋了一位红军连长的遗体,却在红军北上后,不得不向国民党撒谎掩埋的是保安团团长的遗体,并得到伪县政府的嘉奖。解放后,他有口难

辩,而当年和他一起掩埋连长的红军战士好不容易返回天水后,却因背负西路军“逃跑主义”的恶名自身难保。秦球面对“国民党孝子贤孙”的帽子和严酷专政,只好撒谎“当年埋藏的一个坛子里有红军的血衣,可以作证”。于是,他开始以挖山栽树的方式倾其一生寻找证据。他不可能找到坛子,却得到了生存的权利,并给光秃秃的大山坡上了绿荫。严酷的战争和历史的错位,完全改变了一位普通农民的命运,可他艰难的寻找,却把中国农民的人性光辉提升到了极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纪念长征不可或缺的全新形象。

《幻想症》中,“我的奶奶原为西路军女战士,在河西走廊兵败被俘后逃到天水,改名换姓,装聋作哑,嫁给了‘我’爷爷。她因不由自主说了梦话,被当作是阴鬼附体险遭驱逐。眼看身份就要暴露,她只好割掉舌头,这才‘回归’正常的生活。她保留着当年掩护女战友脱险时所赠的一只玉镯,期待解放后相认,可谁会认她这位西路军‘逃跑分子’呢?奶奶死后,‘我’父亲替她继续默默期待着这位女战友。后来才知,当了‘大官’的女战友离休后早已举家移民国外,当奶奶的女战友之子以爱国华侨的身份前来寻找玉镯时,‘我’父亲却拒不相认,毅然把玉镯埋进奶奶的坟里。战争和历史让一些人成为受益者,也让另一些人沦为底层的‘贱民’,可‘贱民’们骨子里对良心、道德的坚守,让我们在历史缝隙中窥视到了广博的乡村、大地对人类灵魂的锻造和升腾,这一点在同类题材中很少看到。

在中篇《英雄弹球子别传》里,孤儿弹球子从小以英雄人物为榜样,曾经从狼口里救下过小伙伴,而自己不仅被狼尾巴扫瞎了一只眼睛,连生殖器也被狼的一爪子抓得“不行”了,可英雄的荣誉让他无怨无悔。但在合作社、生产队、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中,他英雄荣誉的含金量和精神光环也被屡屡折扣。最终,他以扑灭碾麦场上一场大火的名义,让自己壮烈“牺牲”,既保全和“升华”了他这个光棍汉的英雄名分,也让全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光芒”上了一个档次。弹球子的悲剧在我们这个不再崇尚英雄的时代,宛如一口长鸣的警钟,振聋发聩,而秦岭的农民立场和对历史的平视态度,直接把人物推进了历史和当代的双重现场,这是秦岭对当下乡土叙事的一个特殊贡献。

纪伯伦说:“一个伟大的灵魂有两颗心,一颗心流泪,一颗心宽容。”秦岭对中国乡村的纵深思考、深情回望和客观剖析,显然是基于其悲悯情怀和反思精神,这也印证了“好作家是社会的代言人”的说法。